

# 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2018-2019）\*

林果顯 \*\*

## 一、前言

本文以 2018 年與 2019 年臺灣學界有關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為中心，旁及日文的研究成果，就重要與熱門的研究取向，大要地整理回顧。同時參酌歷年回顧與展望的相關文章，簡要地呈現 2007 年以來戰後臺灣政治史的重要主題。《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8 年度》收有 968 筆書目，近代政治史 122 筆，其中戰後(1945 年以後)不含學位論文的期刊/專書論文 42 篇，專書 21 冊；《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9 年度》收有 1199 筆，近代政治史 153 筆，戰後的期刊/專書論文 52 篇，專書 19 冊。兩年研究成果的重要主題有「涉外議題中的臺灣人與東亞脈絡」、「白色恐怖、二二八與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內政治理與媒體宣傳」與「軍事議題」等研究。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主要參考日本《史學雜誌》2019 年與 2020 年的 5 月號，針對前一年度日本史學研究回顧中的〈臺灣〉類別。

本文目的為歸納這兩年度臺灣學界的研究趨向，並略為呈現十三年來研究主題的變化，在行文上著重議題開發與史料運用，同時鑒於學力，無法將所有作品包納，謹此聲明。此外，本次《文獻類目》暫無英文書目，這兩年所出版的系列論文集則收錄過去多年的作品，而相關的學位論文改寫為專書出版或單篇文章投稿情形甚多，上述類別皆暫且割愛，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 二、近年兩年研究概況

### （一）涉外議題中的臺灣人與東亞脈絡

日本學者曾提出「中華民國外交史」與「臺灣外交史」的差異、範圍與起始時間

---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8-201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2020 年 12 月 10 日。承蒙主持人薛化元教授、與談人陳翠蓮教授，以及與會先進寶貴意見，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問題，說明外交史研究中臺灣問題的複雜性。<sup>1</sup> 事實上，臺灣學者許雪姬、鍾淑敏、陳翠蓮與林正慧等人也都注意到「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相異的觀點立場。<sup>2</sup> 這兩年在相關檔案開放與利用越趨積極的情況下，有關涉外的研究在戰後臺灣史蔚然成章，其中，最具特色的在別於官方外交作為的「外交史取徑」，而是從國際情勢夾縫中的「臺灣人」觀點，呈現戰後臺灣人特殊的性格。

其中，陳翠蓮有關臺灣再解放聯盟與美國的研究，便將傳統的「美/中關係」修正為「美/中/臺」關係，凸顯臺灣人在冷戰結構下的過去較少被注意到的聲音。陳氏指出，臺灣在二戰後的去殖民運動中，相當少見地既反共也反中，在關鍵時刻中臺灣人聲量微弱，在路線上則高度親美、「依賴的去殖民」。<sup>3</sup> 以臺灣人為主角，放在冷戰格局中觀察外國與本國政府如何應對臺灣人自主聲音，反映了多元檔案研究下臺灣史課題的改寫可能。

何義麟一系列有關在日臺灣人的研究，也凸顯「臺灣人」在政權夾縫中的處境與心境。何氏整理了戰後初期一直至 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近三十年期間，戰前與戰後赴日的臺灣人，在日本對待前殖民地人民政策、ROC 與 PRC 對華僑的爭取，以及臺灣人自身的政治認同等多方因素的交纏下，造成在日臺灣人在法律上的多重困境。<sup>4</sup> 本課題在臺日學界的隱蔽與出現，相當程度地映射出「臺灣」觀點在戰後臺灣政治史上的進展與可能性。

曾士榮關於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具有將臺灣經驗放在東亞或世界史脈絡的企圖。曾氏從日治臺灣知識人(陳旺成與吳新榮)出發，察覺他們原先具有反殖民政府傾向，但在戰爭後卻逐步成為戰爭協力者，進而從二手研究探討「戰爭與認同」在東亞各地、各地之內的不同階層所呈現的不同情形。<sup>5</sup> 上述三人的研究，對於戰後臺灣人的心境與處境，均提示了進一步再開展的空間。

回到政府作為，任天豪一系列關於中華民國對冷戰局勢理解(perception)的研究，細緻地從官方對不同事件的應對作為，說明中華民國政府如何觀看世界局勢、調整自我定位。在其關於琉球與釣魚臺的專書中，強調此問題的東亞脈絡，亦中國、日本、美國及琉球本身的歷史脈絡，這包含了中國傳統「中華世界」的秩序殘留，日本近代以來對琉球的介入，美國二戰後對琉球的實質支配，以及扶持日本進行反共封鎖的戰略需求，還有琉球對於自己歷史和前途的理解等等。這個案例，既反映了同屬冷戰民

<sup>1</sup> 川島真，〈戰後構想和冷戰時期的東亞國際秩序：分裂國家和熱戰的時代〉，「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課程--近代東亞文明新秩序」，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20年11月23日。

<sup>2</sup> 許、鍾、陳文見本文第四節「十三年來研究概況」；林正慧，〈遷臺後民國史之定位與思考〉，收入：吳淑鳳(等執編)，《近代國家的形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史館，2012)，頁1067-1128。

<sup>3</sup> 陳翠蓮，〈冷戰與去殖民：美國政府對戰後初期臺灣獨立運動的試探與評估(1947-1950)〉，《臺灣史研究》，26：3(2019.9)，頁91-138。

<sup>4</sup> 本文中文版原發表於2014年，2019年收入論文集，因具議題上的價值，故亦在此引介。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收入許雪姬主編，《來去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273-296。

<sup>5</sup> 曾士榮，〈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與反思〉，《臺灣學研究》，23(2019.2)，頁31-55。

主陣營的中華民國和日本，並非全然能理歐美中心的「冷戰」結構理解，還有原先東亞脈絡的糾葛，而且也呈現中華民國政府從爭正統到求生存的覺知。<sup>6</sup>

在相關問題上，任天豪從奄美群島的例子出發，討論中華民國面對琉球問題的濫觴。簡單而言，由於中華民國對於琉球群島的範圍與定位，均選擇依循美國，因此即便中華民國政府曾意識到奄美群島不一定絕對屬於琉球，但中華民國政府並未積極作為。作者認為這不僅埋下日後的釣魚臺領土爭議問題，也顯示中華民國在琉球問題上權力退讓的情形。<sup>7</sup> 另一個案例則是從中華民國政府對在臺創價學會和公明黨的因應切入，認為從琉球而來的日本宗教團體，讓政府因將琉球理解為美國勢力延伸而對其有所忌憚，但創價學會和公明黨在日本提出「中日關係正常化」等主張後，在與 PRC 爭正統為核心價值、並考量日本理應為東亞冷戰盟友的情況下，以「左傾的組織」此種冷戰語彙遂行內戰目的，進行取締。此案例也為中華民國與日本關係投下陰影，中華民國「化內戰於冷戰」、「以反共包裝反共」並未被東亞盟友接受。<sup>8</sup>

在涉外議題中，有關臺灣地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以及美日中等大國如何應對臺灣問題，仍舊是討論重心。李福鐘利用美國國務院檔案，說明學界熟議已久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以 1966 年美國試圖「兩個中國」模式的案例，說明美國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突破性企圖，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對此問題的「堅守立場」。李氏認為，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未體察大多數國家不認同以犧牲中華民國為代價，讓 PRC 進入聯合國，以致喪失留在聯合國內的機會。<sup>9</sup> 陳文賢則歷述 1950 年代至 1971 年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每個階段的關鍵問題與因素，並認為回顧此段歷史，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無法推卸責任，並提示外交主事人員應有的視野及責任、臺灣加入聯合國應有的國家思維及立場，以及化解美國政府對臺灣加入聯合國的阻力。<sup>10</sup>

燕軍有關中(PRC)日媾和研究，整理二戰以來中國與日本「戰爭與和平」的談判與處理過程，其核心關懷在於中日和平狀態是否可能的問題，也涉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否代表全中國的問題。殷氏認為，日本在二次大戰從未正式對中國宣戰，其行為等同國家刑事犯罪，戰後關於和平條約，也由其認為無權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簽署，在 1972 年中日聯合聲明時，也將和平條約擱置，至少兩國至今未針對二戰的戰爭狀態，有一明確的條約終止。此種戰爭未明確終止的狀態，對於雙方關於戰爭賠償、戰後責任歸屬，以及兩國國民情感，造成重大阻礙。<sup>11</sup> 王鍵關於 1945-1995 年美日台關係的長時期研究，主要說明基於圍堵中國及臺灣戰略地位，冷戰時期美日對臺灣抱有戰略獨佔傾向，冷戰後美日臺關係雖然略為鬆散，但既往的戰略規劃並無

<sup>6</sup> 任天豪，《從正統到生存：東亞冷戰初期中華民國對琉球、釣魚台情勢的因應》（臺北：國史館，2018）。

<sup>7</sup> 任天豪，〈奄美「返還」的影響與冷戰初期的中華民國自我定位〉，《國史館館刊》，56（2018.6），頁97-123。

<sup>8</sup> 任天豪，〈由中華民國對在臺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因應看中華民國的東亞冷戰局勢理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9（2018.5），頁135-167。

<sup>9</sup> 李福鐘，〈1966年美國對臺政策的困局與抉擇〉，《國史館館刊》，59（2019.3），頁77-113。

<sup>10</sup> 陳文賢，《被外交孤立的臺灣：聯合國「中國」代表權22年爭議始末》（臺北：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19）。

<sup>11</sup> 殷燕軍，《中日媾和研究：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

收斂，反而以隱性手段推行。王氏認為短期來看臺灣問題的主要矛盾在美國，但長期來看則是在日本，因此中(PRC)美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博弈，本質上應是一個磨合而非絕對衝突的過程。<sup>12</sup>

李戡利用《何世禮日記》等相關人士私人文書，以及英國、日本、美國與臺灣方面的政府檔案，更細緻地討論何世禮與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在「中日和約」簽訂過程的角色。過去有關該條約的研究，臺灣學界偏重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高層的態度、蔣介石與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行動，西方學界著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李戡則指出何世禮在堅持「和平條約」一詞上的關鍵作用，也透露出駐日代表團與外交部及駐美大使館的步調不一，有助於解析中華民國政府在冷戰初期的對外關係上，複雜的部門運作實態。<sup>13</sup>

同樣關於日本議題有森巧的研究，他在過去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研究基礎上，將視野擺在中華民國政府 1950 年代前期的對日政策。他認為，1950 年代前期中華民國致力於日本的反共化，因此設法敦促日本加入東亞反共同盟，此時的對日關係是以協助反攻大陸的軍事利益為主要考量。相對的，日本則是著重兩個中國或臺灣問題，並採行政經分離策政，乃基於經濟層面，兩國對彼此關係的想像有所差距。<sup>14</sup>

作為戰後中華民國任期最長的外交部長，沈昌煥在冷戰時期的外交作為，亦是了解中華民國外交空間何以變化的重要關鍵。《老成謀國》一書集結沈昌煥在各方面的外交作為，王文隆關於沈昌煥與中(ROC)法斷交的研究，清楚呈現沈氏在美國壓力下如何「堅守中華民國立場」，說明交涉與撤館的詳細過程。<sup>15</sup> 任天豪有關沈氏與體育外交的論文，則主要針對各種重要國際賽事與單項體育協會的會籍資格，說明沈氏如何應對 PRC 體育外交的各種作為。<sup>16</sup> 許峰源、楊善堯與陳世局則分別闡述沈昌煥在新加坡、泰國和南越的外交工作。<sup>17</sup>

另一本關於臺韓關係的書籍，則針對雙邊各種外交作為進行討論。朴鍾喆與林志豪關於韓國與 PRC 建交情勢下，朝鮮(北韓)與臺灣互相接近的研究，是相當富有開拓性的外交課題。趙文志以結構現實主義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認為美國態度轉變與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導致國際結構改變，中華民國不再具備影響體系的

<sup>12</sup> 王鍵，《戰後美日臺關係關鍵50年1945-1995：一堆歷史的偶然、錯誤與大國的博弈造成臺灣目前的困境》（臺北：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sup>13</sup> 李戡，〈何世禮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9（2018.5），頁93-134。

<sup>14</sup> 森巧，〈1950年前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以遣送旅日華僑的華日交涉為例〉，收入李福鐘、薛化元、若林正文、川島真、洪郁如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9，頁 151-187。

<sup>15</sup> 王文隆，〈沈昌煥與中法斷交（1963-1964）〉，收入中國近代史學會編，《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20周年研討會實錄》，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193-207。

<sup>16</sup> 任天豪，〈沈昌煥與中華民國的「體育外交」〉，收入中國近代史學會編，《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20周年研討會實錄》，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175-192。

<sup>17</sup> 許峰源，〈沈昌煥穩固中泰邦誼的努力（1960-1975）〉、楊善堯，〈從沈昌煥與李光耀的互動看中華民國與新加坡的關係〉、陳世局，〈沈昌煥與南越中華理事會館產業之交涉（1960-1962）〉，收入中國近代史學會編，《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20周年研討會實錄》，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136-156、70-93、94-135。

能力，和韓國關係重新調整成為必然，而非韓國背棄傳統友誼。朴成林關於太平洋同盟與亞洲反共聯盟失敗的研究，也說明兩國之間存在著「悲劇性」的國際現實，亦即美國與日本的龐大影響力。河凡植則從建構主義觀點討論臺韓關係。<sup>18</sup>

林志龍有關 1950 年代前期中華民國「關閉」政策的研究，則是側重英國在東亞勢力衰微的層面。<sup>19</sup> 黃惠瑄越南撤僑行動與僑民安置的研究，則將涉外事務延伸置內政領域。<sup>20</sup>

## （二）白色恐怖、二二八與其他重大政治事件

在數個政府機構與學術單位的推動下，白色恐怖研究在兩年間累積了相當的成績。蘇瑞鏘回顧了至 2018 年為止此領域的研究情形，指出：相關研究主題漸趨多元，跨領域研究、以官方檔案作為核心史料及博碩士論文都有增加趨勢。在研究對象上側重著名案件與 1950 年代傾共案件，但較欠缺傾共案件人物的評價與其轉變分析。此外，在研究主題上也較少關懷中國時期威權黨國體制、時代變遷、地域網絡、非政治罪名的政治案件等主題，而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關聯性、集體性研究、政治犯家屬，以及史料的探討，仍有發展空間。<sup>21</sup>

蘇文提到的趨勢在這兩年可看到部分端倪。陳進金研究「蘭陽工委會案」與「羅東紙廠案」，除了補充白色恐怖研究過去較少關注的宜蘭外，也提及檔案與口述資料的核心問題。陳氏發現，政治案件當事人的口述資料隨著訪談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透過當事人的官方檔案與其他人的訊問筆錄及口述訪談，對比出檔案與口述的虛與實。<sup>22</sup> 此現象並非白色恐怖研究專屬的問題，但因涉及大規模的政府不當作為與當事者、家屬的艱辛生命歷程，如何更小心翼翼地呈現歷史研究的知與不知，是本文提示的重要工作。吳俊瑩有關蔡懋棠案的研究，除了也和上文一樣，呈現「核覆」制度提高刑度的權力在白色恐怖案件中的重要角色外，也是著手於「聲量」較少的案例，呈現當局在判刑時的各種考量。<sup>23</sup>

李淑君則是在「白色恐怖受難史」定位為「男性的」，以及「受難家屬經驗史」

<sup>18</sup> 朴鍾喆、林志豪，〈韓中建交與韓臺斷交的複合關係研究：以北韓與臺灣對應策略為中心〉、趙文志，〈臺韓關係的歷史演變與未來展望：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朴成林，〈悲劇性國際現實圍繞的韓臺關係：以 1940-50 年代太平洋同盟與亞洲反共聯盟成立構想爭論為例〉、河凡植，〈臺韓關係的形成與特徵：以建構主義觀點探討〉，收入河凡植主編，《臺韓關係的發展：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頁 51-94、9-34、95-110、35-49。

<sup>19</sup> 林志龍，〈英國對中華民國關閉領海政策（1949-1954）的因應〉，《成大歷史學報》，57（2019.12），頁 109-135。

<sup>20</sup> 黃惠瑄，〈中華民國政府在越戰結束前的撤僑行動與僑民安置（1975 年）〉，《檔案半年刊》，18：1（2019.6），頁 36-45。

<sup>21</sup>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3（2019.9），頁 139-180。

<sup>22</sup> 陳進金，〈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在宜蘭：以「蘭陽工委會案」及「羅東紙廠案」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6：4（2019.12），頁 51-96。

<sup>23</sup> 吳俊瑩，〈白色恐怖下的蔡懋棠：以 1971 年政治犯名單外洩案為中心〉，《臺灣風物》，69：4（2019.12），頁 95-140。

定位為「女性的」此種二元觀點之外，關注女性政治犯為主體的研究面向。李氏從女性身體的各種「失調姿態」，論述瑣碎的、身體的、女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語言，以其創傷、痛苦與心身苦難，形成女性政治受難者的集體恐慌與記憶，重新定義國家暴力的意義。<sup>24</sup>

謝英從解析臺灣東部地區三所政治犯監的沿革與運作方式，討論政治犯的處境。包括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以及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綠洲山莊），作者一一陳述其成立緣由，並從關押對象、感訓工作、組織編制和看守兵力，說明最後成立的綠島感訓監獄管理上嚴密許多，政治犯失去更多自由。

陳昱齊從高雄市警察局檔案，研究白色恐怖時期對政治犯及其家屬的監控機制，描繪警備總部核定考管，交地方政府警局，再由地方分局及派出所員警和「義工」（線民）執行各種監控，並向上呈報監控報告。該文也指出其他縣市的「基層政治檔案」有待蒐集外，往上省級與中央級的警政調查單位相關檔案，以及當時涉及監控的相關人士，相關的整理研究工作與轉型正義關係甚大。<sup>25</sup> 陳昱齊另一篇研究政治犯被沒收財產的論文，也具有轉型正義的意義，因為沒收政治犯的財產與政治犯本身的「罪行」並無關連。陳氏釐清政治犯財產遭沒收的法令、沒收財產的概況、處理流程及分配情形。此議題涉及是否遭沒收財產是否發還或另外補償，而財產調查、查封到執行都需要地方政府及警察局的協力，相關事務與檔案徵集也涉及轉型正義工作。<sup>26</sup> 林靜雯由口述訪談對象不願意到願意受訪，談論家屬的生命經驗與白色恐怖記憶，以及訪查者態度、檔案調閱和博物館工作等相關因素，如何促進更多人說出難以言說之事。<sup>27</sup> 以上兩人都涉及歷史研究與現實問題，而這也是此議題得以繼續獲得社會關注並深化的重要事項。

二二八事件研究就數量而言本次成果較少，但也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陳儀深將其近三十年來有關二二八事件各層面的研究集結成冊，從事件原因探討、性質定位、責任分析，最後到紀念二二八與海外臺獨運動的關係，也約略可見臺灣學界有關二二八事件研究的進展。<sup>28</sup> 吳俊瑩關於臺東二二八的研究，整理臺東局面穩定之因，說明縣長避免原住民與漢人合流，以及官民溝通順暢為重要原因。事後逮捕關押的情形，也較他地為輕。<sup>29</sup> 李思儀集中解析雲嘉南地區跨鄉鎮武裝行動的特色，包括飛機場成為攻防所在，以及嘉義市成為談判路線與武裝行動的雙重中心。該文指出事件中展現的分工與應對受益於戰爭時期的動員經驗，但人們表現自主、挺身而出的公共義

<sup>24</sup> 李淑君，〈「例外狀態」下的「失調姿態」：白色恐怖監獄中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失調身體〉，《淡江中文學報》，38（2018.6），頁113-148。

<sup>25</sup> 陳昱齊，〈獄外之囚：白色恐怖時期對政治犯及其家屬的監控機制〉，《臺灣文獻》，70：3（2019.9），頁127-163。

<sup>26</sup> 陳昱齊，〈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被沒收財產初探〉，《臺灣風物》，69：4（2019.12），頁141-168。

<sup>27</sup> 林靜雯，〈「說」難以言說（Saying the unspeakable）的白色恐怖記憶〉，《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9（2018.12），頁259-288。

<sup>28</sup> 陳儀深，《拼圖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

<sup>29</sup> 吳俊瑩，〈二二八事件在臺東〉，《臺灣文獻》，69：4（2018.12），頁65-132。

務，也讓臺灣人再次感受到集體意識。<sup>30</sup>

其他政治案件研究，仍以陳儀深的著作為多。陳儀深的專書《認同的代價與力量》聚焦於蘇東啟案、彭明敏案、泰源監獄案，以及美麗島事件，探問為何在戒嚴體制下，仍有臺獨案件的發生？該書統整這四大案的特點，尋覓貫穿各案間的反抗精神、受難經驗，以及這些案件的臺獨主張對後來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sup>31</sup> 陳儀深也另外從美麗島事件的檔案，發掘出重要的偵訊指示公文，重新陳述事件發展的過程與內外因素的影響。該文從調查局的公文發現，當局指示偵訊方向在於落實將人犯分成「共匪」和臺獨兩類，但後續世界各地的來法關切、美國國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積極介入，影響當局將軍法審判對象縮小為八位，而也影響了日後臺灣解嚴及相關民主運動。<sup>32</sup> 周美霞關於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討論，將因此受牽連的政治受難者、時任臺北美新處處長唐能理(Neal Donnelly)和警方等三方面的說法相互對照，拼湊此一事件的初步梗概。<sup>33</sup>

與白色恐怖相關的主題為轉型(期)正義，周婉窈為少年國民寫了一本未帶註釋、但史料詳實的書籍。該書從最基本的轉型正義定義出發，以淺白的文字介紹白色恐怖受難者概況、相關重要法令、審判程序、重要案例、戒嚴下的日常，並說明解嚴前後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轉型正義的落實，思考對加害者與共犯集團該如何面對與處置的問題。<sup>34</sup> 該書的出版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讓一般大眾更加了解相關議題，因而包括在解嚴三十的系列演講論文集和資助《泰源風雲》重新出版，皆可見其成績。<sup>35</sup> 另外，薛化元從轉型正義的角度重新審視雷震案，除了以雷震日記和相關檔案解析執政當局對雷震及《自由中國》不當的人權侵害，亦由雷震案處置的適法性進行檢討，並探究主要決策者的角色和責任。<sup>36</sup>

高誠晚關於濟州 4·3 事件與二二八事件的比較，雖然涉及外國，但其關注臺灣在「負的遺產」及轉型正義議題的處理，放在此一類別的最後，亦有意義。高氏認為，韓國對於濟州 4·3 事件的轉型正義程序，重點並不在嚴密詳細地檢視國家暴力的實際情形，而是著眼於是否參與反社會的政治體，或是否積極對抗政府的討伐政策、是否損害國家認同，亦即透過檢視思想的純潔性，進行「犧牲者化」的認定工作。反觀臺灣將「受難者」擴及外國籍，作者認為這顯示轉型正義的工作已經超越了國家的制約，是追求東亞追求跨國與跨地域歷史清算的典範。<sup>37</sup>

<sup>30</sup> 李思儀，〈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跨鄉鎮的武裝行動〉，《國史館館刊》，62（2019.12），頁 109-164。

<sup>31</sup> 陳儀深，《認同的代價與力量：戒嚴時期臺獨四大案件探微》（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

<sup>32</sup> 陳儀深，〈戰後臺灣「外省」菁英的臺獨主張：從雷震到張忠棟的類型分析〉，《文史臺灣學報》，12（2018.9），頁 81-104。

<sup>33</sup> 周美霞，〈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之探討〉，《臺灣史料研究》，53（2019.6），頁 70-90。

<sup>34</sup>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9）。

<sup>35</sup> 戴寶村主編，《解嚴30·人權落實》（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8）；高金郎，《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新版）》（臺北：前衛出版社，2019）。

<sup>36</sup> 薛化元，《雷震與1950年代臺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9）。

<sup>37</sup> 高誠晚著、傅玉香譯，〈韓國與臺灣轉型正義之比較：以濟州4·3事件的問題點為中心〉，《文史臺灣學報》，12（2018.9），頁 7-40。

### (三) 內政治理與媒體宣傳

內政方面這兩年的研究並未明顯集中在特定主題，約可絡見國民黨基層工作、菁英的發聲、整體政治發展的再評價，以及傳媒研究。國民黨來臺後如何厚植基層實力，拉近與臺灣民眾的距離，作為隱藏性區黨部的民眾服務站向來是受到關注的對象。林江臺系統性地整理中國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各項工作內容，並梳理國民黨內部相關法規，呈現國民黨統合服務工作單位(尚有地方政府的社會服務處與警察機關所設的警民服務處)、同時獨占服務事業(1954年修正「社會服務設施綱要」，同一地區社會服務設施，以設立一個為限)的過程。本文對於民眾服務站的重要面向，例如社會調查、介入選舉以及與政府機關職權衝突的部階雖有提及，然可能受限於史料，較少深入發揮，或有待進一步梳理。<sup>38</sup>

李泰翰從救國團成立前的暑期青年軍中服務運動，呈現1950年代初期當局對青學生的組織動員情形。該文除指出由青聯會及軍人之友社主辦的青年運動，與後來的救國團有所承續關係外，也說明大學與軍中的合作，以及總政治部的角色吃重，奠定後來救國團的基礎。<sup>39</sup>

陳儀深選擇四位「外省」菁英，對其臺獨主張的形成過程進行類型分析，目的在豐富臺獨主張的形成脈絡。作者認為雷震與殷海光之所以從反共擁蔣與中華民族主義，轉向主張在臺灣成立新的國號與國家(殷的統獨表態較不清楚，但在相識者的談訪中略為揭露)，實與兩位的自由主義內在理路(個人自由優先於國家自由，民主與反民主)相關。外交家楊西崑在1971年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對美國提出「中華臺灣共和國」與公民投票決定臺灣未來地位等主張，則顯現為了政府存續所做的理性決擇。而張忠棟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的外省人，成為加入載有「臺獨黨綱」的民進黨人與臺獨色彩鮮明的臺灣教授協會，作者認為此種轉變是「與時俱進」，也認同其後來對臺獨運動的支持是自由主義式國家認同的「調整」而非徹底轉變。<sup>40</sup>

相對於上文，蘇瑞鏘則觀察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的角色，探索日治時期以來民主經驗的「縱向繼承」，補充過去較常談論的中國自由主義「橫向移植」。蘇氏指出該組黨運動與1957年的地方選舉有密切關係，不應如過去只集中討論1960年4月至9月。而該組黨運動上承日治政治結社傳統，下啟黨外階段的民主運動，而非孤立的民主運動，為此歷史事件重新評價。<sup>41</sup>

薛化元關於戒嚴的討論也帶有翻案或再考察的意味。薛氏整理施行於臺灣的數

<sup>38</sup> 林江臺，〈中國國民黨對基層社會的滲透與監控：以1950年代民眾服務站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52(2018.12)，頁52-81。

<sup>39</sup> 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前的暑期青年軍中服務運動〉，《臺灣學研究》，23(2019.2)，頁1-29。

<sup>40</sup> 陳儀深，〈戰後臺灣「外省」菁英的臺獨主張：從雷震到張忠棟的類型分析〉，《文史臺灣學報》，12(2018.9)，頁81-104。

<sup>41</sup>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文史臺灣學報》，13(2019.10)，頁89-117。

個戒嚴令，確認了 1949 年 5 月 20 日陳誠發布的臨時戒嚴令沒有上級機關核准的證據，同時該戒嚴令的內容關於死刑的內容於法無據，處於違法狀態。而 1949 年 12 月 28 日由代行總統職權的閻錫山頒布的全國戒嚴，將臺灣劃為接戰地域，則其程序合法，但在正當性上，1950 年 6 月美國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1954 年又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基本上臺灣澎湖與金馬不同，長期未發生戰事。因此，本文指出臺灣長期戒嚴是政治強人濫用行政裁量的結果。<sup>42</sup> 薛化元另一篇關於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臺灣政治發展的比較研究，也試圖修正過去認為 1950 年代是國民黨當局壓制性格最強的年代、1960 年代則是威權統治鬆動的圖像。薛氏指出，從 1950 年代走向 1960 年代，不僅不可能組反對黨，也無法在原有憲法規範下完成統治者更迭，反而出現總統進一步擴權、軍人在政治領域發言地位提高與在野力量衰退，在政治發展上其實更為緊縮。<sup>43</sup>

在憲政體制上，有王郁中對李登輝時代修憲的研究。該文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包括取消部分行政院長副署權，以及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等，說明歷次修憲的現實政治考量，以及對日後的憲政影響。<sup>44</sup>

李廣均關於桃園縣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的研究，試圖打破「竹籬笆」一隔離模式，亦即竹籬笆內的眷村凝聚團結，對外阻礙了省籍之間的互動與了解。他指出桃園縣的外省籍人口集中於八德、龍潭與中壢，但這裡的列管眷村戶數卻難以容納如此多人口，反而是聚集於列管眷村或軍隊營區附近的自力眷村，才是外省籍人口所在之處。這說明所謂眷村文化並不一定會因為列管眷村拆除了消失，也可對外省籍族群有更立體、充滿不同社會差異的理解。<sup>45</sup>

有關原住民法律的議題，雖也可歸類於原住民研究，但涉及現行法秩序的根本原理，因而在此介紹。吳豪人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與主流社會私有財產制的討論，從最基本的法律秩序出發，試圖翻轉市民法理論的核心。吳氏認為，個人權利為主題的三大重點：契約自由、意思自由、所有權絕對，最後一項已被資本主義侵奪，真正保護的法益在於財產，而非人權。吳氏由此出發，認為解決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問題，或可從原住民傳統規範借鑒。<sup>46</sup>

與原住民相關的研究尚有語言問題。陳南君從 1949 年「山地教育方針」、「1951 年山地施政要點」、「臺灣省各縣山地推行國語辦法」到 1950 年代末「臺灣省加強山地教育實施辦法」，透過山地鄉國語推行員小組與《山光周刊》，說明在原住民區域所推行的國語運動，較一般平地地區更加嚴峻。<sup>47</sup>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sup>42</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長期戒嚴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再考察〉，《臺灣風物》，69：3（2019.9），頁 97-124。

<sup>43</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再評價：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比較〉，《臺灣風物》，68：4（2018.12），頁 167-204。

<sup>44</sup> 王郁中，〈再造民主：論李登輝時代修憲的原因（1988-1997）〉，《中正歷史學刊》，22（2019.12），頁 167-204。

<sup>45</sup> 李廣均，〈初探桃園縣的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1950~1990）〉，《桃園文獻》，6（2018.9），頁 71-99。

<sup>46</sup> 吳豪人，《「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19。

<sup>47</sup> 陳南君，〈進入山地，請說國語：概述 1950 年代臺灣原住民族國語政策〉，《原住民族文獻》，36（2018.10），

委員會語言小組也針對各種國語運動的法令作一初步整理。<sup>48</sup> 同樣關於語言，卻是針對臺語的研究則是吉田真悟的文章。他從兩個國語和臺語出發，認為政府的強制性作為不一定是語言的慣用的絕對因素，民主化後臺語的振興過程，或許可對文化霸權理論做出修正或發展的貢獻。<sup>49</sup> 此外，針對原住民族主體建構，從法律、運動、部落經驗、知識建構等方向，思考自主型自治的可能。<sup>50</sup>

有數篇研究關於媒體與宣傳領域。楊秀菁整理中央廣播電臺(中央臺)的歷史發展，交接清冊與內部刊物《中央臺通訊》，以過去較少談論的1980年到1997年為時段，說明在臺灣內外情勢劇烈變動下，對大陸廣播的發展與轉變。作者將1980年後分成「用流行音樂『反攻大陸』」、「中國天空的競爭」與「從敵對到和談」三個階段，揭露了對大陸廣播從肅殺的政令轉向軟性內容的趨勢，也呈現中廣關注中國大陸市場後與央廣之間的競爭過程，同時，因應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央廣節目內容也因兩岸局勢和緩而隨之調整。<sup>51</sup> 周馥儀有關民營廣播電臺的研究，則指出在1950年代抑制「匪波」的需求下，使民營電臺有開設可能，但其成立者主要為外省籍，並且與黨國高層有交情、出身特務體系，或為民意代表，與當局關係密切。<sup>52</sup> 林佳樺梗概地描述1950年代國民黨的宣傳體系、宣傳策略以及成效評估，指出國民黨利用各種媒介將政令設法下達基層，並以淺顯易懂及娛樂方式，讓所謂一般人民了解。<sup>53</sup>

陳佳宏對臺灣主流平面媒體關於「美麗島林宅血案」的報導分析，則在成果已豐的美麗島事件研究中另闢蹊徑。該文指出一開始輿論將凶手塑造為黨外連結海外臺獨、勾結共匪的理想三合一敵人，但血案被害人在人倫、世代、性別、權力的「弱者」形象，引發社會上的溫情氛圍，緩和了美麗島事件以來輿論對相關人士的攻擊，也使被告們在相對溫和的輿論情勢下，走向大審。<sup>54</sup> 陳明成以《臺灣新生報》的圖文報導呈現末代「國民參政員」選舉的過程，利用競選廣告與投票相片說明當時的選舉氣氛，也從過程的各種離奇事情彰顯戰後初期臺灣的選舉，已有黨國力量的高度介入。<sup>55</sup> 陳明成另一篇以《和平日報》為對象的論文，挖掘出過去較少被提及的「假候選人」事件，亦即楊克煌與謝雪紅在國民參政員及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中，藉由《和平日

頁2-12。

<sup>48</sup>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語言小組，〈從政府公文書初探「推行國語運動」對原住民族語言使用限制的歷史脈絡〉，《原住民族文獻》，36（2018.10），頁13-30。

<sup>49</sup> 吉田真悟，〈臺灣的語言政策與hegemony（文化霸權）：以兩個國語和臺灣為中心〉，收入李福鐘、薛化元、若林正文、川島真、洪郁如主編，《跨越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9，頁179-207。

<sup>50</sup> 施正鋒、邱凱莉主編，《原運三十年：回顧與前瞻》，臺北：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2018。

<sup>51</sup> 楊秀菁，〈政治變革下臺灣對中國大陸廣播的發展、競爭與挑戰（1980-1997）〉，《臺灣風物》，68：2（2018.6），頁105-160。

<sup>52</sup> 周馥儀，〈戒嚴時期臺灣民營廣播成立背後的黨國之手〉，《臺灣史料研究》，51（2018.6），頁2-24。

<sup>53</sup> 林佳樺，〈1950年代國民黨對民眾宣傳臺灣為「復興基地」形象之成效初探〉，《史匯》，21（2018.11），頁35-61。

<sup>54</sup> 陳佳宏，〈「美麗島林宅血案」輿論情勢之分析：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師大臺灣史學報》，11（2018.12），頁99-144。

<sup>55</sup> 陳明成，〈末代「國民參政員」選舉（1946.08.16）在臺灣：以《臺灣新生報》的圖文報導為主〉，《臺灣史料研究》，52（2018.12），頁23-51。

報》報導戲謔或假消息，藉以表達對當局控制選舉的抗議。<sup>56</sup>

其他內政相關研究，王泰升對於清代以來的調解制度在現代司法中的存在，指出並非單純的轉譯，而是在不同時代國家政權不同的考量下而出現的產物。而戰後的調停係源自中國法院內的調解程序，出自對民事紛爭解決的傳統文化觀，以及威權國家在政策上不願投資於司法建設所置。<sup>57</sup>

林慶弧以《山范交接檔案》，亦即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與省立圖書館第一任館長范壽康的交接清冊等資料，講述戰後初期該館接收與營運情形，呈現配合當時政策下的各種作為。<sup>58</sup>

#### （四）軍事議題

軍事議題在新觀點和新史料的運用下，收穫頗豐。許進發回顧了臺灣有關八二三砲戰的研究概況，區分為戰史研究與島嶼作戰參考兩大部分。前者項下再分為人物、整體戰役、陸戰、海戰、空戰、運補作戰、美軍行動、戰後防務與科技，後者則有整體戰役、海戰、空戰與運補作戰四方面。作者認為，研究主題集中於空戰、海戰與運補作戰，對於最重要的砲戰本身則較少研究，而美軍協防僅見第七艦隊的護航行動，未見航空母艦特遣部隊以及美國空軍等在金門以外的整體性軍事部署。而在島嶼作戰參考方面，金門的反砲戰應可為重要軍事案例，但未有專門研究。在資料方面，國防部先制攻擊的「沖天計畫」，以及外島防衛的「太白計畫」中有關美軍接管臺灣空防任務的資料，仍有待詳盡資料開放。作者在最後指出可利用臺灣、中國與美國三方面檔案互相比對，可發展出更多新題目。<sup>59</sup> 另一個類似的主題是羅志平有關金門戰地歷史研究的回顧，他除了梳理各大戰役的研究成果，也針對檔案文獻保存、戰役紀念物、影視史學與口述歷史加以檢視。不論哪一類作品，羅氏強調金門在地的觀點，同時也認為利用美國檔案及不同學科的視角，將可使金門史提升至更高層次。<sup>60</sup>

利用美國檔案的想法，可在杜正宇的研究中略見實現。杜正宇利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軍事部門檔案與美國軍方出版品(陸軍軍事史中心、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作戰署史政處)，探問為何美軍在二戰期間未佔領臺灣的原因。該文詳盡探討美軍原本規劃的登陸臺灣軍事計畫(鋪道行動，Operation Causeway)，包括計畫的形塑過程與軍事行動規劃內容，以及最後決定放棄攻臺的決策過程，並反駁諸多解釋計畫中止既有說法。最後，即便攻臺未曾實施，但為了掩護攻佔呂宋，臺灣於 1944 年 10 月起遭受大

<sup>56</sup> 陳明成，〈《和平日報》的再挖掘與再評價：兼及該報策劃謝雪紅成為民代「候選人」乙事〉，《臺灣史料研究》，54（2019.12），頁 2-35。

<sup>57</sup> 王泰升，〈再訪臺灣的調解制度：對傳統的現代化轉譯〉，《臺灣史研究》，25：1（2018.3），頁101-136。

<sup>58</sup> 林慶弧，〈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與營運：以《山范交接檔案》為例之觀察（1945-1947）〉，《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23/24（2019.4），頁 69-106。

<sup>59</sup> 許進發，〈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戰役之研究回顧與展望：以軍事作戰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52（2018.12），頁82-104。

<sup>60</sup> 羅志平，〈金門戰地歷史研究的回顧與省思〉，《止善》，26（2019.12），頁 87-115。

規模空襲，躲空襲成為二戰期間臺灣人的集體記憶。<sup>61</sup> 無獨有偶，王景弘亦同樣利用美國檔案討論攻臺計畫的決策過程與內容，包括在臺成立軍政府的相關規劃，同時詳盡地重建對臺大轟炸的過程。<sup>62</sup>

沈昱廷呈現戰後初期臺灣中的日本軍隊角色，亦即從第十方面軍改組而來的「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說明其轉變過程、善後任務，以及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沈氏指出該聯絡部延續了戰時指揮體系，穩定軍情，聯絡部部長安藤利吉反對部分臺灣仕紳與日本軍人推動的獨立運動，維持戰後臺灣安定的局面。<sup>63</sup> 楊護源則著重在臺日軍的管理與遣返，在基隆與高雄成立運輸司令部與戰俘管理處，高雄則設立第二戰俘管理所，負責集中遣送前的管理。此工作為中美合作進行，相較於中方，美方對日本抱持意，成為在留日本人的庇護者。<sup>64</sup> 此文可說是沈昱廷論文的後續發展。

葉惠芬尋找陳誠在反攻大陸計畫中的身影，為他的所為及限制提出整體性的評價。葉氏指出陳誠協助制訂諸多計畫，召開陽明山會談，並主持反攻督導會議，協助擬定反攻作戰準備重要事項。因體認反攻實力不足，而與蔣介石發生「草山爭論」，即便如此，仍勉力籌措財源，赴美溝通，組成備戰小組，向立法院提出國防特別捐案，但也引來美方關切，阻延了反攻時程。<sup>65</sup> 李展平有關八二三戰臺籍征屬的文章，則揭露公部門對於同一場戰役的犧牲者照顧，存在著不合理也不平等的制度。<sup>66</sup> 金智對於 1958 年至 1978 年中華民國海軍的發展，臚列組織、裝備、教育訓練等各項工作，並指出此時期的成果與缺失。<sup>67</sup>

相對於上述偏屬高層的軍事議題，也有研究從都市空間和日常生活切入，呈現戰後特殊的軍事影響。陳啟仁從西子灣隧道及其北側的防空設施，說明貫穿太平洋戰後與冷戰時期的不同戰爭需求，對於西子灣地區的影響，同時擴及西子灣浴場、壽山公園與附近市街興衰，重構都市空間的歷史拼圖。<sup>68</sup> 管仁健有關戒嚴時期軍人「限婚令」的討論，整理戰後歷次有關軍人婚姻限制的法令與應對情形，同時也指出解嚴後部分人士利用未報准而主張婚姻無效，致使此一戒嚴時期的產物影響至解嚴後。<sup>69</sup>

### 三、日本學界概況

<sup>61</sup> 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美軍攻臺之計畫與轉折〉，《國史館館刊》，55（2018.3），頁51-82。

<sup>62</sup> 王景弘，《臺灣走過烽火邊緣·1941-1945》（臺北：玉山社，2018）。

<sup>63</sup> 沈昱廷，〈戰後初期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之成立、運作與社會影響〉，《逢甲人文社會學報》，36（2018.6），頁133-157。

<sup>64</sup> 楊護源，〈戰後在臺日軍的管理與遣返：兼論高雄運輸司令部與第二戰俘管理所〉，《高雄文獻》，9：1（2019.6），頁55-72。

<sup>65</sup> 葉惠芬，〈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國史館館刊》，59（2019.3），頁27-76。

<sup>66</sup> 李展平，〈誰聞暗夜哭聲？八二三戰役臺籍征屬血淚〉，《臺灣史料研究》，51（2018.6），頁59-86。

<sup>67</sup> 金智，〈在臺整軍備戰時期中華民國海軍的建軍發展(1958.8-1978.12)〉，《軍事史評論》，25（2018.6），頁105-160。

<sup>68</sup> 陳啟仁，〈西子灣隧道及防空設施之歷史沿革初探〉，《高雄文獻》，8：2（2018.8），頁46-73。

<sup>69</sup> 管仁健，〈戒嚴時代的軍人「限婚令」初探〉，《文史臺灣學報》，12（2018.9），頁131-165。

日本《史學雜誌》每年五月號對日本歷史學界過去一年的成果分門別類介紹，以下將〈臺灣〉類簡單翻譯，並補充其他未收錄其中的作品。2018年〈台灣〉項下的研究包含9本專書，99篇論文，史料集13冊，史料介紹10篇文章。相較2019年，此年戰後臺灣政治史的部分較無鮮明的特色，中村元哉《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藉由自由主義的系譜，將民國政治史與臺灣政治思想史加以聯繫，在日本學界為跨領域(民國史、臺灣史)的嘗試。<sup>70</sup> 川島真〈中華民國(台灣)からみた文化大革命〉則討論文化大革命後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接近的事例，在重視「反攻大陸」的冷戰思惟下，看似在外交上有承認社會主義的空間，但臺灣此時發生民主臺灣聯盟案，卻也顯示內部仍阻絕左派思想。<sup>71</sup> 另外，戰後初期臺灣史則有兩篇，分別是駒込武從林獻堂日記討論他在1945年的動向，以及余姿慧討論二二八事件前《民報》與《臺灣新生報》的對日觀。<sup>72</sup>

2019年〈台灣〉項下的研究共15本專書，162篇論文，資料集9冊，以時期而言，十九世紀前10項，二十世紀前半100項，二十世紀後半40項，其他30項，側重日治時期，從長期視野重新檢視既有課題為一大特色。戰後的研究雖然數目較少，卻被列為2019年日本臺灣研究的重要特色，因為數本質量厚重的專書從國際關係的視角分析臺灣在二戰後的景況。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詳述中華民國政府「維持現狀」的具體意義，以及中華民國政府不同時期選擇可能性的轉變，為2009年川島真等合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該書於2020年新出增補版)以來，具有通史性質的臺灣外交史最新著作。<sup>73</sup> 許珩《戰後日華經濟外交史》則是聚焦於經濟合作的層面，特別注重斷交前後兩國關係以及臺灣國際空間爭取的過程。<sup>74</sup> 深串徹《戰後台湾における対日関係の公的記憶》討論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兩國關係，處理日華與日臺的歷史問題。<sup>75</sup> 鶴園裕基則以盟軍占領初期的在日中國人、在日臺灣人處境為例，描繪「華僑臨時登記」對象的界線，以及(非)登錄者在法律上的地位等問題。<sup>76</sup> 這些著作皆利用近年來新開放、特別是大量的臺、日雙方史料，並且探問「脫殖民地、脫帝國」的各種問題，以及「日臺、日華二重結構」的國際秩序重組面向，可說重視國際、外交為本年的重要特色。

日本這兩年出現了長期臺灣(史)研究的回顧文章，所提的問題和視角關係到戰後政治史，在此也一併介紹。日本最大的臺灣研究團體「日本臺灣學會」，在2018年召開設立二十週年的紀念研討會，主題之一為「『新世代』的臺灣研究」，分別從歷史學、人類學、文學與政治研究，回顧近十年(2008-2018)日本的臺灣研究，算是接續2008

<sup>70</sup> 中村元哉，《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東京：有志舎，2018)。

<sup>71</sup> 川島真，〈中華民國(台灣)からみた文化大革命〉

<sup>72</sup> 駒込武，〈林獻堂日記にみる台湾脱植民地化の隘路〉；余姿慧

<sup>73</sup> 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

<sup>74</sup> 許珩，《戰後日華經濟外交史 1950-197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

<sup>75</sup> 深串徹，《戰後台湾における対日関係の公的記憶》(東京：国際書院，2019)。

<sup>76</sup> 鶴園裕基，〈送還、登録、法的地位：占領期在日中国・台湾人に対する移動管理の始動(1945-1947)〉，《現代台湾研究》，49(2019.7)，頁38-62。

年該學會創立十週年時的「回顧與展望」。在菅野敦志執筆有關十年間日本的臺灣史研究回顧中，他特別反省與強調日本人的臺灣史研究所持有的視野。他指出，許多日本的臺灣研究著眼於「近代日本統治對臺灣近代化/發展帶來什麼影響」，高度關切日本的扮演的角色，但他認為今後的研究應該增加類似臺灣對戰後日本重建的各種影響。同時，他也指出日本研究者應避免將「臺灣圖像固定化」，應該不斷質問類似「親日的臺灣人」這樣的慣常說法。他以若林正丈「(TAIWAN)中華民國的臺灣化」、福田圓「(PRC)一個中國原則的起源」、佐僑亮「(USA)兩個中國政策的模索」及家永真幸「(CHINA&TAIWAN)的國寶」四本著作，說明這十年來日本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中，關照冷戰、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特性。菅野氏認為，今後臺灣史研究將受到三個I的影響：臺灣人的認同(Identity)、兩岸關係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以及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sup>77</sup>

菅野氏所提的這四本著作有強烈的國際關係面向，而其中家永真幸的研究展現了跨學科、跨時代與跨域精神，藉由貓熊與故宮文物，梳理清末中國以來「國寶」概念的傳入與轉化，同時伴隨著近代中國國家概念的成立，觀察「國寶」如何在1949年之前與之後成為PRC與ROC的競爭場域。<sup>78</sup>筆者於2017年在東京適逢該書的「書評會」，與會者從人類學、政治學、外交史等角度熱烈提問，或許也提示了之後日本有關戰後臺灣政治研究的多元與跨域傾向。

春山明哲針對百年來日本的臺灣史學研究，提出「什麼是臺灣史研究？臺灣史應該由誰書寫？怎麼書寫？」的核心問題。春山氏將焦點放置於戰前的日本帝國與戰後日本，以及以日文書寫的研究成果，區分為1895年至1945年的帝國統治臺灣時期、1945年前後戰前遺產與戰後的斷裂與延續、1945年至1970年代臺灣留學生的貢獻、1973年至1987年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再啟動、1990年代至今日本臺灣學會創立後的蓬勃發展。春山氏認為伊能嘉矩作為日本臺灣研究的開拓者，將臺灣放在世界中加以定位，在寫史之外其動員的學問與企圖其實更加廣泛。而由後藤新平所推動的舊慣調查為首產出的一系列成果，如岡松參太郎的《臺灣私法》、竹越與三郎的《臺灣統治志》等，呈現知識與權力的緊密關係(學知)，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則將世界思想與國際政治的觀點帶入觀察臺灣社會，這些未必是以「史學」為出發點的著作，但都豐富了臺灣史的視角。而因日本戰敗而停滯的臺灣研究，在1970年代前半出現了一批臺灣留學生多彩的研究成果，包含黃昭堂、戴天昭、許世楷、江丙坤、涂照彥、劉進慶，以及在此前後的王育德與戴國輝，使得日本學界正視臺灣研究的空缺。春山氏也指出，這些留學生的臺灣研究帶有探討「臺灣人是什麼？」「我是誰？」的核心關懷。<sup>79</sup>

<sup>77</sup> 菅野敦志，〈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史研究、この10年から考える〉，《日本台湾学会報》，21(2019.7)，頁1-18。

<sup>78</sup> 家永真幸，《国宝の政治史：「中国」の故宮とパン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7)。

<sup>79</sup> 春山明哲，〈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史研究の100年—伊能嘉矩から日本台湾学会まで—〉，《アジア経済》，60:4(2019.12)，頁27-56。

如果稍微跳過複雜細瑣的發展，春山氏在此文文末檢討了各家關於「什麼是臺灣史」的主張，包括吳密察、若林正文、岡本真希子、Benedic Anderson、吳叡人、曹永和與陳延濶的想法，這也顯示近年來關於臺灣史研究的範圍、性質與可能性，仍然受到高度的關注。若林正文在 2020 年春天，集合橫跨各年齡層的臺灣史研究者所編著的《臺灣研究入門》，特別引用此文章，並將臺灣研究加以定位，認為日本學界應該從帝國的學知，轉變為互相理解的學知，而對於臺灣，則認為「主體性建構的學知」方興未艾。<sup>80</sup> 對於來自鄰國的研究社群自我檢討與定位，臺灣研究者今後如何回應與開展，或許是豐富臺灣史研究，當然包含戰後臺灣政治史的未盡課題。

#### 四、十三年來研究概況

以下透過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蒐集歷年議程與發表論文，對研究主題略作整理，網頁資訊從 2008 年的議程開始紀錄，得以一窺 2007 年以來的研究趨勢。檢視歷年議程，除了 2013 與 2014 年之外，均有「近現代臺灣政治史」或「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回顧，而 2014 年許雪姬教授曾撰述 2004 至 2013 年的梗概式回顧，其中包含政治史。可見政治史此一分類在質量上，難以忽視。

不過，若是單從數量上來看的話，政治史類別的研究成果起伏非常劇烈。總體研究成果(書+單篇論文+學位論文)2007 年至 2019 年曾有單一年度達近 200 筆，但也有落至未滿 100 筆的情形<sup>81</sup>。必需說明的是，這些數字包含了不同語種與國家的研究成果，其收錄範圍也需逐年檢視，要分析前仍得更細致的檢視。參與過回顧的許雪姬、陳翠蓮與薛化元教授對於近代政治史或戰後政治史的數量與問題皆曾提過見解，包括政治史定義與範圍可能影響筆數計算、政府檔案開放情形、重大事件適逢週年、文化史等途徑更受重視而排擠政治史研究，以及在語言掌握上影響學位論文題目的選擇等等。<sup>82</sup>除了上述觀察外，筆者認為，若能擴大比較規模，包含與其他分類各年度的比較，或是再繼續觀察數年，並仔細觀察各年度重心所在，以及思考政治史與其他分類的重疊問題，或許能更明白其中緣由。

<sup>80</sup> 若林正文、家永真幸(編)，《台灣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頁ix-xi。

<sup>81</sup> 詳見各年度《文獻類目》。

<sup>82</sup> 詳見後文一一引用。

表 1 歷年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研討會論文表

| 回顧年度          | 作者          | 研討會篇名                                      |
|---------------|-------------|--|
| 2007          | 鍾淑敏         |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br>外交、台灣國際法律地位及法律史     |
|               | 陳翠蓮         | 台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br>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                |
|               | 薛化元         |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br>外交、台灣國際法律地位及法律史     |
| 2008          | 李福鐘         | 2008 年臺灣國際外交史暨早期史研究回顧                      |
|               | 陳翠蓮、<br>鍾淑敏 | 2008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二)：<br>日治時期之統治與抵抗        |
|               | 陳佳宏、<br>蘇瑞鏘 | 2008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三)：<br>反抗史與臺灣認同          |
|               | 林果顯         | 2008 年臺灣政治史的回顧與展望(四)：<br>威權體制與蔣經國研究        |
| 2009          | 陳翠蓮         | 2009 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 2010          | 薛化元         | 近代臺灣政治史                                    |
| 2011          | 陳佳宏         | 近代臺灣政治史                                    |
| 2012          | 無           |  |
| 2013          | (許雪姬)       | (2004-2013 年臺灣史研究概況)                       |
| 2014-<br>2015 | 李福鐘         | 2014-2015 年台灣戰後政治史研究回顧：<br>二二八事件及國際外交史之新成果 |
|               | 林果顯         | 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br>以內政治理為中心(2014-2015)     |
| 2016-<br>2017 | 陳翠蓮         | 2016-2017 臺灣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回顧與展望                 |

資料來源：「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網址：<http://thrrp.ith.sinica.edu.tw/index.php> 擷取日期：2020 年 12 月 4 日。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列有 2008 年以來歷年的研討會議程，以及部分的文章。從題目來看，大部分會以近(現)代政治史涵蓋戰後政治史的回顧，亦不少年度將外交與內政區分。2007 年研究的回顧由鍾淑敏、陳翠蓮與薛化元三位教授負責，分別回顧「統治政策與制度」，及「抵抗、認同與知識建構」兩大分野，以及「外交、法律與臺灣國際地位」。「統治政策與制度」戰後的部分不多，鍾教授認為政治經濟史切入研究有其可觀之處。<sup>83</sup>「抵抗、認同與知識建構」在抵抗與認同的架構下，研究主題集中在從臺灣民眾史出發的集體思維、政治認同與抵抗行動，以及政治權力與知識建構，包括節日與儀典、教育與傳播媒體。另外，二二八研究在新史料與新詮釋上仍是重要主題。該文也指出，研究取向上跨越「統治史 vs. 反抗史」的格局，進一步

<sup>83</sup> 鍾淑敏，〈2007年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統治制度與帝國政策〉，《漢學研究通訊》，28:4(2009.11)，頁10-18。

從「抵抗權力」的研究走向「解構權力」。<sup>84</sup>

2008年與2009年政治史研究的回顧由陳翠蓮教授擔任。2008年適逢蔣經國逝世二十週年，以及2007年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該年召開的會議論文在本年度出版，因此這兩方面的主題呈現在數量上。本年重要主題為國際外交史(中華民國/臺灣與聯合國議題、個別外交事件、兩岸關係)，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二二八與校園、區域性研究、外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二二八與傳播媒體、白色恐怖與政治案件)，蔣經國與威權統治，官定意識型態與媒體宣傳。<sup>85</sup>

2009年政治類筆數連續兩年大幅下滑，陳翠蓮教授以「怵目驚心」形容，但也提出「政治史」分類的定義可再重新思考。此年也正好是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六十週年，同時也有多本二二八事件的論文集出版，因此在主題上，集中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1949流亡書寫，以及其他課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體制、威權體制與社會控制、文化控制機制)。該文認為政治史定義、政治立場與學術研究的分際、史料與理論等問題仍需思考，而臺灣戰後政治史與中華民國史如何的對話，為歷史學者的重要課題。<sup>86</sup>

2011年陳佳宏教授因撰寫「近現代臺灣政治史」的回顧，將許多議題跨時代整理，以下儘量析出戰後的部分，但仍可看到日治時期的影子。這也是許多先進提醒過的，使用戰後只是為了方便區分時段，許多議題是跨越戰前與戰後，也有複雜的斷裂與延續過程。「戰後臺灣史」該年度的重要主題分別為殖民、去殖民與再殖民(去殖民與再殖民、殖民與認同主體性)、從自治到民主化(自治精神的傳承、黨外運動、女性參政、知識青年與傳媒角色)、政治事(案)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案件)、國際、涉外關係(二戰結束前後、臺美關係、臺灣國際地位)、政策與制度面向(警務政策制度之更迭、獄政發展、法務、軍務、憲政體制、區域行政發展、政權過渡與接收)。該文指出，臺灣人面對權力的各種反應、民主化運動，以及政治事(案)件為成果較豐碩的主題。<sup>87</sup>

楊秀菁與薛化元也針對2011年臺灣史研究做整體回顧，在政治史方面的分類與陳佳宏教授略同，皆別為：統治政策與制度、國家認同的塑造與轉向、政治參與、政治事(案)件、國際與涉外關係，以及傳播研究。<sup>88</sup>

如果查看議程，2012、2013年的研究回顧沒有包含政治史回顧，但2014年有許雪姬教授對2004-2013年的整體回顧，可略為反映部分情況。該文將此十年的研究筆數(含學位論文)依五大類別統治，分別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史料，政治類除

<sup>84</sup> 陳翠蓮，〈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漢學研究通訊》，28:4，頁1-9。

<sup>85</sup> 陳翠蓮，〈2008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7:2(2010.6)，頁177-180。

<sup>86</sup> 陳翠蓮，〈2009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09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09年12月17-18日。

<sup>87</sup> 陳佳宏，〈2011年近現代臺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09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7日。

<sup>88</sup> 楊秀菁、薛化元，〈2011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0:2(2013.6)，頁213-254。

了2007年超過30%，其餘平均約15-17%左右，社會與文化類最多，經濟類最少。至於研究斷代上，該文分為通論、早期、清代、日治與戰後共五項，日治一向多於戰後，清代最少。主題上與戰後相關的部分，戰犯的跨國研究以及地方學是這十年來蓬勃發展的趨勢，而整體發展的隱憂上，受到學術建置、資源分配或政治影響等外部因素，是共同面對的困境。<sup>89</sup>

2014-2015年研究成果的回顧，由李福鐘教授和林果顯分別負責二二八事件及國際外交史，以及內政治理兩部分。李教授指出由於保密局檔案的出現，這兩年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成果相當豐碩，另外，蔣介石研究與1950年代臺灣政治史、日本的臺灣研究，以及關注冷戰高峰期的戰後臺灣外交史，為重要主題。<sup>90</sup> 林果顯以內政治理為中心，認為在具體議題上，政權轉換時官方與臺灣社會的互動、政府內部與美國因素的介入，以及海外臺灣人的處境成為觀察重點；受惠於資料庫的建置，省議會和地方政治運作的研究增加，另外，白色恐怖的成果亦相當豐碩。同時旁及日本學界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從日本自身的關懷出發，關切國際政治角力中的臺灣處境，媒體研究、民主化過程、地方選舉和政黨為內政治理的重要主題。英文著作的作者相對多元，議題偏重國家認同、民主化、政策形成與國防。<sup>91</sup>

2016至2017年的研究回顧，陳翠蓮教授指出重要主題為戰後初期(國府接收)、二二八、國族認同轉變。臺灣地位、條約與主權問題亦多所關懷，並且新冷戰史的研究浮現(例如林孝庭與宋怡明的著作)。此外，跨學科與跨時代的政治史書寫亦成為焦點之一。<sup>92</sup>

## 五、代小結：未來展望

綜合上述，這十三年來戰後臺灣政治史中的熱門主題，首先應為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相關研究，不斷開發新史料與切入角度外，近兩年則著重在地域網絡、性別、家屬、基層監控機制，以及轉型正義各種問題。其次，統治體制與戰後初期政權轉換的斷裂與延續問題，是為一大特色，近年關心海外臺灣人、國籍問題、人群流動與戰犯等「戰後處置」的議題。最後，臺灣地位與大國互動亦始終為外交面向的關切焦點，這幾年來美日等大國對臺灣內部統治上的影響在研究上逐漸受到矚目。

<sup>89</sup> 許雪姬，〈2004-2013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4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12月5-6日。

<sup>90</sup> 李福鐘，〈2014~2015年臺灣戰後政治史研究的若干面向〉，《漢學研究通訊》，36:3(2017.8)，頁11-20。

<sup>91</sup> 林果顯，〈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以內政治理為中心(2014-2015)〉，《漢學研究通訊》，36:3，頁21-31。

<sup>92</sup> 陳翠蓮，〈2016-2017臺灣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回顧與展望〉，「2018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8年12月6日。

隨著史料開放程度與研究興趣，有幾個課題是戰後臺灣政治史可能的發展方向。首先，因為大量政府檔案開放而圍繞著「中華民國如何可能」的議題，在國際政治與內政上皆有再深化的條件。以「中華民國如何可能」而言，在國際政治的面向，幾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如果繼續加入美國、英國、日本等大國檔案的運用，不論是傳統軍政部門的相異意見、政府高層和幕僚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間的談判和情報蒐集，或是重視文化影響、意識型態推廣與學術教育滲透的「文化冷戰」議題，將能豐富與發展臺灣的「冷戰史」，而非「冷戰」時期(在臺灣海峽兩岸)的「歷史」。<sup>93</sup> 以美國檔案的運用為例，除了美援之外，二戰末期戰爭史、戰後初期接收史、二二八事件研究，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關係，這幾年已見開拓。近年臺美人社群對自身歷史開始關注，逐步集結資源與蒐集資料，陸續有包含民間廣播電臺資料、手稿的出版整理，皆可預期拓展研究課題。<sup>94</sup>

另外，官方作為的重要層面還包含內政方面。特別是省級政府層級的作為，以及特定政策在中央與省級行政部門、民意機構與黨機器之間的流轉，亦頗具開拓性。省級政府的課題並非不受關注，但 1949 年前後臺灣省政府權力在何處、以何種方式擴張？1949 年後省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誰、在何處、與誰合作、以何種方式抵抗、最後如何解決？省政府在整個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中，扮演何種角色？由於不同部門的權力範圍與決策流程並不相同，這些問題都有待從特定議題切入，一一梳理。例如，以筆者較為熟悉的外國出版品進口管制來說，戒嚴時期的進口標準由國民黨中央確立，出版品登記為內政部，取締及邊境管制由警備總部擔綱，但實質的審查工作則長期由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負責。<sup>95</sup> 又如農村與都市土地改革的決策過程，亦有論者從黨、立法院、省級議會、省政府等不同部門的討論，彰顯省級政府與民意機構在內政重大議題上不可忽視的角色。<sup>96</sup>

其次，「臺灣如何可能」的思考面向，如果指涉的是非中華民國政府主導的內外作為，且由海內外臺灣人的處境出發，或以臺灣為主體的各式運動與想像，既有的研究已揭示了諸多嘗試與成果。這裡想強調的是，如同前述有關國籍、戰犯、「美/中/臺」關係的研究，所謂的「臺灣」觀點從民間、反抗或受難等相對於統治者的概念，進一步向前推展為討論內外交融、跨域流動、多國政府、海外臺灣人社群、以及多元認同與抉擇的課題，其目標，或可理解成凸顯冷戰結構夾縫中被各方力量忽視的臺灣(人)特殊性。在各方史料繼續大量公開的情況下，上述課題具有持續發展的條件，也更考

<sup>93</sup> 潘光哲，〈「重思東亞脈絡下的冷戰」專號導言〉，《思與言》，57:4(2019.12)，頁3-4。

<sup>94</sup> 何義麟，《越洋民主呼聲：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手稿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0)。

<sup>95</sup>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5(2016.5)，頁193-250。李進億關於淡水何防洪政策的討論也與省府關係密切，見李進億，〈戰後淡水河防洪政策的規劃與實施：以《省府委員會議檔案》為中心的觀察(1963-1996)〉，《臺北文獻(直字)》，205(2018.9)，頁211-262。

<sup>96</sup> 廖彥豪、瞿宛文，〈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8(2015.3)，頁69-145；廖彥豪，〈「必須保衛市民」：195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推動都市土改的理想與困境〉，「2020第五屆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等主辦，2020年11月14日。

驗研究者多語言與多檔案的耕耘。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上述兩個方向，也就是「中華民國如何可能」與「臺灣如何可能」的思考，並非完全涇渭分明，正是近年來上述兩種思考的研究進展，顯示了些許整合的可能性。舉例而言，與美國斷交後所研擬的「臺灣關係法」，同時涉及(1)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的談判，(2)臺美人遊說團體與立法部門之間的關係，以及(3)這個法律對中華民國對外關係和對內統治的影響，與臺灣人如何看待和因應，就同時跨越了兩種思考面向。日本學者若林正文曾提出「七二年體制」的說法，認為被聯合國取消中國代表權的臺灣，在 1972 年之後其國際地位的基本性格大體確立。<sup>97</sup> 然而，影響臺灣國際地位最深的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邦交至 1979 年才斷絕，其後「臺灣關係法」如何安排雙方「民間」的交流層次與範圍，如何協助在國際組織中的名稱與會籍，以及如何影響臺灣內政等等議題，或許較 1972 年更具規範性。換言之，探討「臺灣關係法」的制訂過程與相關議題，或許能部分修正補充「七二年體制」，或提出類似「七九年體制」的新解釋模型。從更多層次檢視其他類似的歷史關鍵時刻，並加上如英國、日本等其他較少被利用的大國觀點，或許還可再開拓更多的研究題目。

第三個可以發展的課題是解嚴前後民進黨、國民黨與其他政黨的歷史，不論是街頭或議會的行動，還是成為執政者的各種作為，有必要更加系統性地關注。這個課題主要是受日本學界的刺激，例如該國學術振興會於 2012-2014 年補助「反對黨的誕生」三年計畫，2015-2018 年補助「臺灣政治體制移行期的民主進步黨」三年計畫，包括資料蒐集、口述訪談、工作坊、研討會與國際共同研究，顯示日本學界在此一課題已累積相當基礎。<sup>98</sup> 近年來對於國民黨檔案的徵集與保存多所討論，但至少對於後來成為執政黨的民進黨，關切其檔案的留存與開放，擴大相關人士、特別是執政後的口述訪談，以及思索如何解釋建制化後的「臺灣」，同樣需要戰後臺灣政治史領域學者的關注。換言之，過去在野時期的「臺灣人」一躍成為廟堂之上的官員或具有執政身分的政治團體後，如何解釋其轉變，以及如何定義「中華民國」與「臺灣」的學術內涵，在此一研究課題中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

最後，雖然因為收錄時間較為久遠，不在本次回顧的範圍，但這兩年以來臺灣史各主題而企畫的論文集陸續出現，展現了較長時段、具備主題性通史的企圖心。包括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的臺灣史論叢，<sup>99</sup> 張炎憲教授生前策劃的「典藏臺灣史」，<sup>100</sup> 或是

<sup>97</sup> 若林正文，《台灣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頁367-400。

<sup>98</sup> 若林正文（研究代表者），「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學術振興會 科学研究費基盤B，2012-2014；若林正文（研究代表者），「台湾政治体制移行期の民主進歩党：「改革型」民主化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相克」，日本學術振興會 科学研究費基盤B，2015-2018。

<sup>99</sup> 包含許雪姬（編），《來去臺灣：移民篇》、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法律篇》、謝國興（編）《進香·醮·祭與社會文化變遷：民間信仰篇》、李文良（編），《成為臺灣客家人：客家篇》、劉翠溶，《臺灣環境史：環境篇》、吳聰敏（編），《制度與經濟成長：經濟篇》、許佩賢（編），《帝國的學校·地域的學校：教育篇》、呂紹理（編），《如何日常·怎樣生活：社會生活篇》、范燕秋（編），《現代醫學在台灣：醫學公衛篇》、洪郁如（編），《性別與權力：女性篇》、張隆志（編），《島史的求索：史學篇》。

<sup>100</sup> 此系列書籍由玉山社出版，包含劉益昌，《史前人群與文化》、詹素娟，《臺灣原住民史》、林偉盛，《大航海時代》、溫振華、戴寶村，《漢人社會的形成》、林呈蓉，《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臺灣》、何義麟、

臺灣商務出版社的《課綱中的臺灣史》，都可見此趨勢。<sup>101</sup> 回到戰後臺灣政治史，不論是「國民黨一黨獨裁體制」對黨、政、軍、特的全面性描述，「中華民國臺灣化」對戰後臺灣政治體制變化的整合性解釋，甚至是「台日外交」的長時期發展，均甚為仰賴外國的通史性研究成果。如何在新觀點與新史料的條件下，撰寫臺灣學者新的戰後臺灣政治史，並不是個新的想望，如何按部就班往此目標邁進，或許是回顧了十三年來的研究後，繼續供大家思考的未盡課題。

---

蔡錦堂，《臺灣人的日本時代》、李筱峰、薛化元，《戰後臺灣史》。

<sup>101</sup> 陳鴻圖(編)，《課綱中的臺灣史：跟著專家學者探索歷史新視野》(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20)。